



滇国

青铜艺术

云南民族

张增祺 主编

美术全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THE COMPLETE WORKS OF YUNNAN
NATIONAL FINE ARTS
BRONZE ARTS OF THE DIAN KINGDOM

COMPILED BY
ZHANG ZENGQI

PUBLISHED BY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YUN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国青铜艺术 / 张增祺编.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12
(云南民族美术全集)
I. 滇... II. 张... III. 青铜器(考古) — 云南 — 古代 IV.
K87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3560 号

责任编辑 彭 晓 王玉辉 张文璞

摄影编辑 张 刘 唐世龙

装帧设计 彭 晓 张文璞 王玉辉

责任校对 杨 斌

滇 国 青 铜 艺 术

张增祺 主编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美术出版社

制 版 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7 1 / 16
印 张 20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86-715-1/J·438

定 价 350 元 (带合装 420 元)

版 权 所 有 · 翻 版 必 究

云南民族美术全集

总 顾 问

王天玺 尹 俊 梁公卿

顾 问

贺全礼 贺光曙 胡廷武 徐发苍 王晋元 李忠翔 姚钟华

总 监 制

贺全礼

总 策 划

胡廷武

监 制

周文林 吴 垠 欧阳常贵 方绍忠

主 编

李昆声

副 主 编

彭 晓 吴 垠 张永康

滇 国 青 铜 艺 术

顾 问

贺光曙 徐发苍 李昆声 熊正益 张永康

主 编

张增祺

副 主 编

彭 晓 张 立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绍忠 王玉辉 王洪君 吴 垠 陈 琦 张 立 张 刘 张兴宁
张绍聪 张增祺 周文林 杨 帆 杨德聪 赵丁丁 赵少春 唐世龙
萧明华 彭 晓

撰 文

张增祺

摄 影

(以姓氏笔划为序)

邢 毅 杨 帆 张兴宁

绘 图

高永平

英文翻译

杨德聪

目录

CONTENTS

云南文明之光 —— 绚丽多姿的滇国文化 张增祺 (3-33)

揭开滇国历史之谜 (3-7) 滇国名称的由来 滇国历史概述 滇文化主要墓地简介 滇文化青铜器分类 关于滇王金印的若干问题

规模巨大的生产领域 (7-16) 农具、耕作及收获 家畜饲养与驯服 狩猎活动及捕猎方式 纺织工具与纺织技术 青铜器铸造技术

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 (16-20) 服饰 饮食 房屋 交通 习俗

造型奇特的兵器制作 (20-22) 兵器种类 军事装备

生动活泼的音乐舞蹈 (22-26) 音乐 舞蹈

别具一格的装饰艺术 (26-32) 青铜器装饰图案 青铜工艺品

A Civilization Light of Yunnan

---The splendid 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Dian Kingdom by Zhang Zengqi (3-33)

To unveil the history of Dian Kingdom (3-7)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Dian Kingdom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history of Dian Kingdom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major graveyards of Dian Kingdom A classification of the bronzes of Dian culture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gold seal of Dian King

A large scale production scopes (7-16) Production tools cultivation and grains Domestic animals breeding and domestication Hunting activities and hunting methods Tools and techniques of spinning and weaving Casting techniques of bronzes

Rich and colorful lives (16-20) Costumes and ornaments Food and drink Houses Transportation Customs

Weapons with unique shape (20-22) Kinds of weapon Military furnishment

Lively musics and dances (22-26) Musics Dances

Distinctive ornamental art (26-33) Ornamental design and pattern Bronze craftwork

图版 (35-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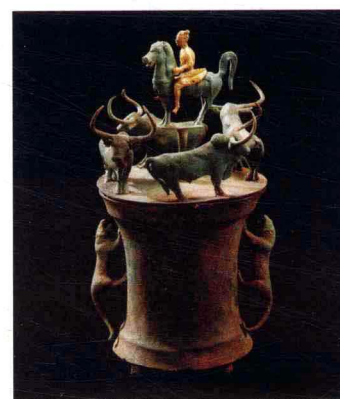
生产 (35-51) 生活 (53-95) 军事 (97-153) 舞乐 (155-183) 装饰 (185-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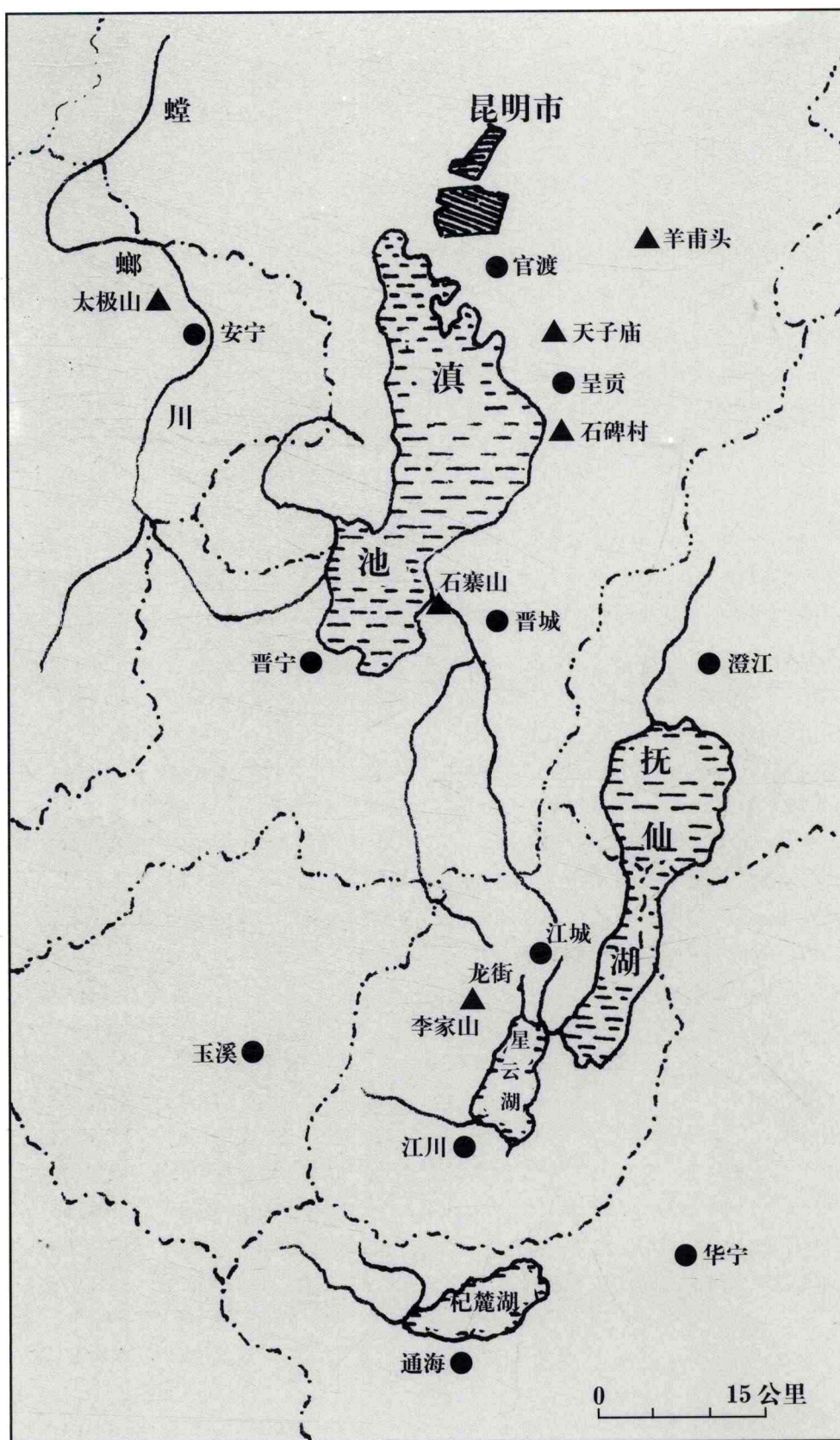
PICTURE (35-279)

Production (35-51) Life (53-95) Military Affairs (97-153) Dance And Music (155-183) Decoration On The Bronzes (185-279)

图版目录 (281-310)

PICTURE CATALOGUE (281-310)





滇池区域滇文化墓地分布图

云南文明之光——绚丽多姿的滇国文化

张增祺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滇”，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盛兴于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古王国，西汉后期走向衰落，东汉初叶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滇国由盛转衰，直至国除，大致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历史。

揭开滇国历史之谜

滇国名称的由来

滇国以滇称，因境内有“周回数百里”的滇池得名。滇池称滇，又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见《后汉书·西南夷传》，称汉代于云南设立益州郡，郡治滇池县（今晋宁县晋城镇），其境内“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未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滇池出水口在今昆明市西南海口镇，两岸陡峭、河道狭窄，每逢山洪暴涨，池水确有倒流之象，以致沿岸农田村舍被淹没，故历代无不以治理滇池水害为“当务之急”。滇池水流经安宁、富民境内称螳螂川，流经禄劝县境为普渡河，后注入金沙江（长江上游）。因我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流多作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流向，惟滇池之水由南向北，倒流之说或源于此。另一说见《汉书补注》，文曰：“上林赋文成颠歌，文颖注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滇与颠同。然武帝前滇池县本作颠县，后人因池加水为滇耳。滇池读为颠池，以滇为义。说文：颠，顶也。言益州（郡）各水四面下注于卑地，此县之地与池独居高顶，当不以颠倒为义。”两说均以滇为颠，一以颠倒解，一以山颠解，未知孰是。

滇国历史概述

有关滇国历史，过去在我国古代史研究中基本属于空白。这大概因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古代多未使用文字，他们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被湮没无闻了。我国古文献上对滇国情况虽有片断记载，亦多来自传闻或转录，以致人们对丰富多彩的古滇国文化一直了解甚少。

有关滇国和滇王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文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

以东，北至檉榆、名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当时云南以滇池区域为中心即滇国的聚居区，滇国东部为夜郎国，北部有邛都国，西部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即昆明国。滇和昆明都属于云南古代民族中的主要部落，他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文化。

滇国历史悠久，经济和文化早已发展至较高水平，然而真正受到中原的重视，也只是在西汉汉武帝时。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国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张骞将出使大夏（今阿富汗）时所见蜀布、邛杖的事情报告汉武帝，并说由西南地区经身毒（今印度）至大夏，不仅路途更近，而且可避免西北地区匈奴的干扰，与中亚诸国建立更多的联系。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几次派使臣到云南求身毒道，此举虽得到滇国的大力支持，但因滇西地区昆明国的拒拦而未能成行。也正因为这件事，西汉王朝才知道有关滇国的更多情况。

至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西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一举平定了盘踞两广地区的南越割据政权，兵临滇国之东南境。此后一年，又征服了滇国东部的夜郎国和北部的邛都国，使滇国更加孤立。西南夷部落相继被西汉王朝各个击破后，汉武帝曾遣使劝说滇王降汉入朝，停止抵抗。当时滇王依仗自己尚有实力，又有“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部落支持，拒不投降。于是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首先击灭滇东北之劳浸、靡莫，以兵临滇。由于滇王失去同盟者的支持，汉师又紧逼滇池区域，只得放弃抵抗，降汉为臣。至此滇国隶属于西汉王朝，汉廷又在原滇国领地设立益州郡，郡治滇池县（今云南晋宁县）。

有关滇国被灭亡及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经过，《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中均有记载：“……上使王然于以破越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

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也许因为滇王降汉有功，或西汉王朝在滇国故地设置郡县时，滇王并未采取敌对行为，或者因为新附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原王朝还不便直接行施管辖权，所以汉武帝尽管在云南设立益州郡，但仍“赐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这样，在当时的滇池区域就形成中原王朝的郡县制与滇国地方政权并存的局面。事实上，西汉王朝在云南初建的郡县形同虚设，虽派有郡太守和县令一类的地方官吏，但多住在附近的犍为郡南部“遥领”或“遥治”，很少有人到职视事。不过这样的“国中之国”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至西汉后期，由于当时内地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边疆，当地的郡县制亦不断得到巩固，并逐步取代“复长其民”的滇王地方政权。自东汉初叶，滇国及滇王名称虽很少见于史籍记载，但滇文化余波尚存；到东汉中叶，长达数百年的滇国与滇文化已完全销声匿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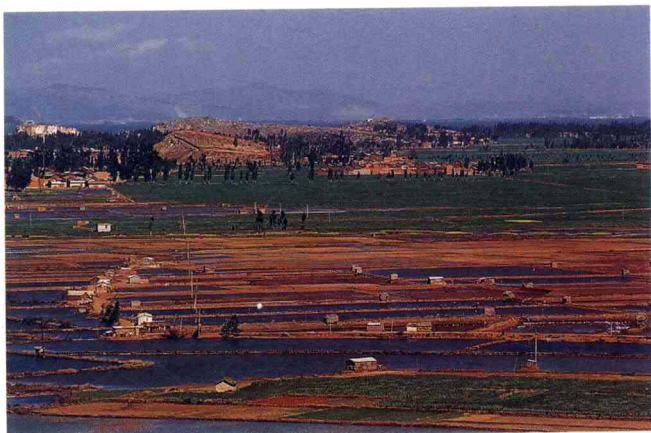
滇文化主要墓地简介

有关滇国的历史概况，除《史记》和《汉书》等古文獻上有片断记载外，更丰富、具体的研究资料，则多半来自滇文化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新中国建立以来，滇池区域及滇东地区发掘出不少滇文化遗物，为研究滇国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正如恩格斯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所说的：“在塔西陀和托勒密以后，关于日尔曼尼亚内部情况和事件的文字史料便中断了，但是我们却得到了其他一系列更明了的史料，这就是可以归入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许多古代文物。”

滇文化遗物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全部是1951年云南省博物馆等文物单位成立以后进行的。从1955年至今的40余年中，先后发掘过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石碑村、小松山，昆明上马村、大团山，官渡羊甫头，安宁太极山，宜良纱帽山，嵩明凤凰窝，东川普车河，曲靖八塔台、横大路，昭通营盘，玉溪刺桐关，个旧石榴坝、黑蚂井，元江洼垅等古墓群及古遗址。现将其中规模巨大，出土文物最多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及官渡羊甫头三处滇文化墓地作简要介绍如下：

(1) 晋宁石寨山墓地。石寨山位于晋宁县晋城镇西南约5千米的上蒜乡石寨村旁，北距昆明市约40余千米，东南距江川李家山50余千米。滇国墓地分布在该山之东南坡，距滇池东岸仅1000米许。石寨山又名鲸鱼山，南北长约500米，东西最宽处为200米，山顶高33米。从滇池岸边遥望石寨山，确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田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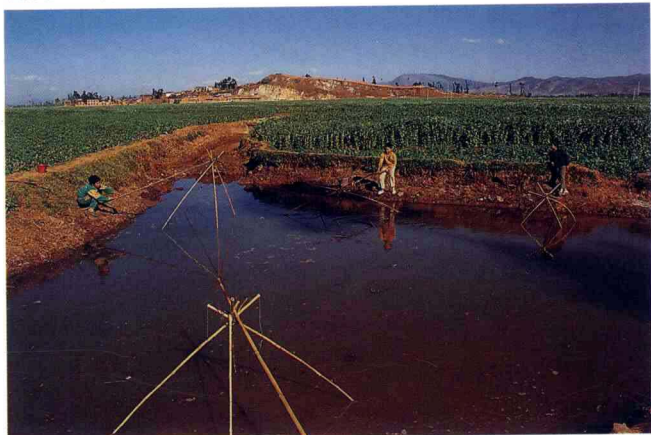
1955年3月，云南省博物馆在此进行过第一次发掘，历时21天，清理西汉时期的古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100余件。其中有铜鼓和两件铸有纺织和祭祀场面的贮贝器，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滇池区域古代居民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由东向西眺望的晋宁石寨山墓地

此次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于是在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在石寨山墓地进行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20座，出土各种文物近4000件。奇珍异宝，美不胜收，闻名遐迩的滇王金印，就是在这次发掘的6号墓出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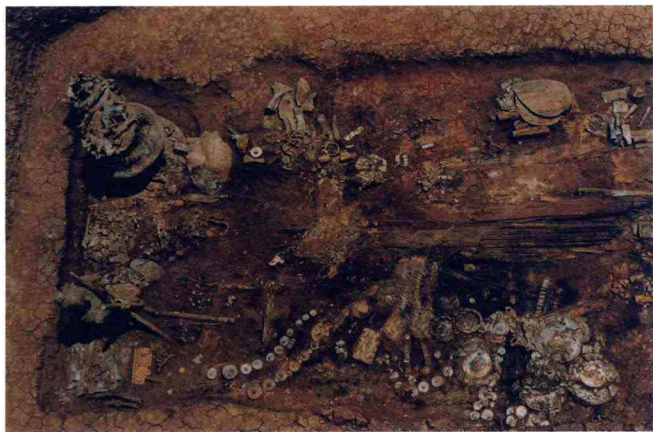
此后石寨山墓地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但出土文物均不及第二次多，而且许多墓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1958年冬，云南省博物馆为配合云南省少数民族调查工作，在石寨山进行过第三次发掘，清理滇文化墓葬12座，出土文物400余件。1960年，又进行了第四次发掘，清理滇文化墓葬16座，出土文物200余件。至此，石寨山滇国墓地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1965年，该墓地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直得到妥善保护，国内外游客及有关专家学者到此参观游览不计其数。



由西向东眺望的晋宁石寨山墓地

1995年以来,由于社会上盗墓之风日甚,石寨山墓地也遭盗掘,虽有高围墙加以保护,仍不能幸免。后经有关文物部门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管会及晋宁县文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该墓地进行了第五次发掘,清理墓葬36座,出土文物500余件(不包括大量玛瑙、玉石珠管及金片、金珠等装饰品)。

通过以上五次发掘,总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全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有少量为大墓,长3米~4米,个别有长5米以上者,宽2米~3米,最宽的4.7米,深2米~2.85米;其余大量为中小型墓,一般长2米、宽1米、深0.3米~1米不等。大墓中多有木质棺槨,随葬品几件或10余件不等,也有的除一串孔雀石小珠外,无其他遗物。



石寨山71号墓器物分布

(2) 江川李家山墓地。李家山位于江川县城北16千米早街村后的山头上,西北距石寨山约50余千米,北距昆明市80余千米。其山势为南北走向,背靠多依山,面向江川坝子和星云湖,从山脚至山顶高约100米,滇文化墓地分布在其山顶及半山腰。1972年初,云南省博物馆在此进行过第一次发掘,清理滇文化墓葬27座,全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青铜器及铁器等随葬品共1300余件。著名的牛虎铜案、虎牛鹿贮贝器及铜枕等青铜器精品,就是在此次发掘中出土的。

1991年底至1992年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地区文管所及江川县文管所组成考古队,对李家山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58座,出土各种随葬品2000余件。此次清理的墓葬也都是竖穴土坑墓,其中有大墓,也有中小墓。一般大墓长4米~6.8米、宽2.9米~5.6米、深3米~4.4米;中小墓多分布在大墓周围,长2米~2.5米、宽0.5米~1米,深度多不超过1米。有的大墓填平后,再于填土中挖一圆底形圆坑,由别处运来一块重约数百公斤乃至一吨以上的锥尖形大石



江川李家山墓地

块,尖端向上埋入圆坑中,很可能有镇邪和防止盗掘的双重意义。一般大墓中多有木质棺槨,随葬品数量较多。每墓以200余件者居多;中小墓多无葬具,随葬品只有几件或10余件不等,有的一无所所有。

(3) 官渡羊甫头墓地。羊甫头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东约3千米的一个椭圆形缓丘上,1997年11月,该地被昆明公安边防学校征用为训练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古墓葬多座,出土部分青铜器。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及官渡区博物馆在此进行过正式发掘工作,共清理西汉时期滇文化墓葬488座,东汉墓36座,出土青铜器、陶器与漆木



官渡羊甫头墓地发掘现场

器等珍贵文物约4000余件。

羊甫头墓葬全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主要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及解肢葬等。墓室结构也较复杂,一般大墓中多有腰坑,部分墓内有脚窝、二层台和头脚箱等,有的墓壁经过青灰泥浆抹光处理,显得格外光滑、平整。大墓中多有棺槨,有的外槨用稍加平整的整棵圆木搭建而成,木与木之间多用榫口相接。随葬品中有大量青铜兵器、工具及生活用具,器形、纹饰与石

寨山、李家山滇文化遗物相同；陶器数量较多，且有一定的组合关系，尤其发现漆绘陶器，为过去滇文化墓葬中从未见过。

羊甫头墓地规模最大、出土随葬品最多的为113号墓，仅墓底腰坑内就发现近千件文物。其中有大量完整的漆木器，以漆绘的兵器、工具木柄为主，另有部分漆绘的杖饰及鹰爪、牛头、鹿头、猴头、人面、鸟类及兔形工艺制品，色彩鲜艳，形象逼真，为过去滇文化墓葬中从未看见过。小墓结构均较简单，多无葬具，随葬品数量也很少。



羊甫头113号墓器物分布

滇文化青铜器分类

目前云南各地出土滇国青铜器约10000余件，根据其不同器形和用途，大致分为五大类，共90余种。

(1) 生产工具类：铜锄、铜铲、铜铤、铜斧、铜镰、铜爪镰、铜锯、铜凿、铜削、铜刀、铜锥、铜锤、铜鱼钩、铜纺轮、成套织布工具（包括经轴、布轴、打纬刀、幅撑、分经杆、投纬器等），以及钺形器、刷形器和蛇形网状铜器等。

(2) 生活用具类：铜壶、铜洗、铜罐、铜碗、铜盘、铜杯（包括高壁杯及耳杯）、铜勺、铜匕、铜炉、铜奁、铜案、铜盒、铜尊、铜釜、铜甑、铜鼎、铜铎斗、铜盃、铜桶、铜针、铜针筒、铜线盒、铜伞盖、执伞铜俑、铜灯、铜熏炉、铜枕、铜镜、铜印、钱币及铜房模型等。

(3) 兵器类：铜剑、铜斧、铜戈、铜钺、铜矛、铜戚、铜啄、铜叉、铜棒、铜簇、铜尊、铜铍、铜盔、铜箭、铜弩机、各式铜甲及铜弓模型等。

(4) 乐器类：铜鼓、铜钟、铜铎、铜铃、铜箫、曲管和直管铜葫芦笙等。

(5) 装饰及工艺品类：铜贮贝器、圆形铜扣饰、长方形铜扣饰、不规则形铜扣饰、铜带钩、铜镯、铜发簪、铜珠饰、铜牛头、铜鹿头、铜戒指、铜孔雀、铜水鸟、铜

牛、铜马、铜鱼、铜鸳鸯、铜鹿、各种杖头铜饰及各种马饰等。

关于滇王金印的若干问题

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金印一方，蛇钮，蛇背上饰鳞片纹，蛇头伸向右上方。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此印印钮与印身分别铸成后再焊接一起，印文为凿制，笔划两侧的凿痕尚清晰可见，篆文“滇王之印”四字。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降汉，西汉王朝虽在滇国故地设立益州郡，但仍赐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此印是否为西汉王朝所赐，无从查证，但它是一代滇王之印，6号墓即某代滇王墓葬则是毫无疑问的。根据汉代印信制度，诸侯王印无蛇钮之制，传世的四夷王侯（即外臣王）及邑长之类的印章倒有作蛇钮者，但为数极少。可见西汉时滇王的身份比较特殊，与一般内臣诸侯王和外臣四夷王均有所不同。另外，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其印文都是铸成的，只有部分军职官印才有凿文者，那是因为急于封拜之用，来不及铸造所致。滇王金印乃凿制而非铸文，疑为西汉王朝仓促间制成此印，用于封赐降汉之滇王。或原铸文金印收藏于滇国内府，作为传世的信物，临时作此复制品为一代滇王随葬。但无论如何，此金印的发现对确定晋宁石寨山墓地的性质、时代，以及墓主身份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之高，任何一件滇国出土文物都是无法比拟的。

从滇王金印的质地及印文内容看，无疑是属于汉代一枚级别很高的官印。按汉制，一般官印多为铜质，御史大夫比二千石以上官员用银印，诸侯王及丞相等高



滇王金印

官员用金印，皇帝之玺则用玉。印钮的形制更复杂，常见的有龟钮、鼻钮、圆钮及覆斗钮等。龟钮之印必须千石以上的官印才能使用，少数民族及外国君长之印多用驼钮或蛇钮，其它各种印钮的使用则不十分严格。汉代官印的大小也有较固定的格式，西汉初期一般为2厘米见方，武帝以后增至2.3厘米~2.5厘米。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为蛇钮、金质，2.4厘米见方，汉篆及白文等特征，均符合西汉中期的官印定制，可见它为西汉王朝颁发是可以肯定的。至于是否为原物，或为了随葬根据原物临时凿制的，我以为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即使是临时凿制的，也总该有个真品吧。单凭想象，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创造出一个滇王金印的。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倒是这个被西汉王朝加封并赐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的滇国君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王？如果说他是个诸侯王，就像汉代的刘姓王和异姓王一样，然而《史记》、《汉书》专以内臣王为对象编制的王侯表里并无滇王；假如说他是一个外臣王，与朝鲜、西域、匈奴等国的君长一样，可滇王是内附后汉武帝亲自册封的，而且他是在西汉王朝设置的益州郡内行施职权，显然不是单纯的外国君长。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栗原朋信先生认为，西汉时的滇王是“兼有内、外臣两种性质的中间王”，倒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见解。

关于滇王金印的规制，的确是一个很费解，但又很有趣的问题。据《汉旧仪》载，我国汉代的印信制度大致为，凡颁发给诸侯王的印章，均用黄金制作，印文为“某王之玺”；如为列侯印，亦用黄金制成，但印文曰“某侯之印”。汉朝皇帝颁赐外国君长的印信则有所不同，印虽用黄金制作，但印文前都要加一个“汉”字，后面再附一个“章”字，如“汉某某之章”。当然，属于内臣王侯的印上，就不需要再加一个“汉”字了。

汉武帝封滇

王，赐滇王金印的印文为“滇王之印”，与汉代颁发给内臣王侯和外臣王的印章规制均有不同。究其原因，正如栗原先生所说，如果滇王完全是个外臣王的话，那么给他的印就应该是“汉滇王之章”；假如他是个内臣王，就必然给他“滇王之玺”的印；如若滇王仅是内臣中列侯的级别，其印信就只会是“滇侯之印”了。然而滇王的性质已如前述，因为他不完全是外臣王，所以首先就将外臣王印信规制前的“汉”字取消了，后面的“章”字也不再附加。不过他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内臣王，所以也不好后面加上“玺”字，成“滇王之玺”。因为汉代颁发给外臣王的印信，一般总要比内臣王压低一至两个等级。也就是说，一个外臣王通常只能得到相当于内臣列侯等级的印绶。因此为了表示滇王具有外臣王的特点，就必然要较内臣王压低一级，在印文的使用上，势必要模仿内臣列侯的规制，在金印的后面加一个“印”字。这大概就是“滇王之印”这个意想不到的破格特例其所以会出现的缘故了。照此见解分析，滇王与中原王朝始终未形成真正的君臣关系，尽管他接受了汉武帝的封赐，仍能在新置的益州郡内“复长其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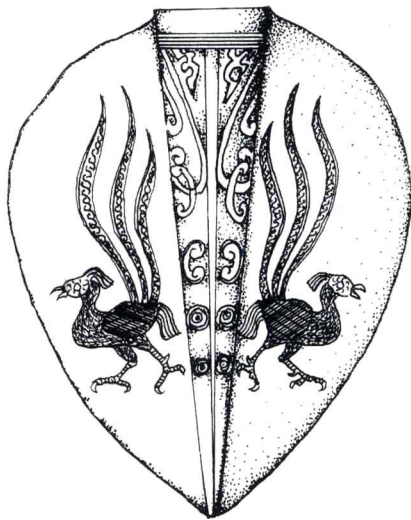
规模巨大的生产领域

农具、耕作及收获

农业是滇国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滇国时期的墓葬中，大多有数量不等的青铜农具出土，其中铜斧、铜锄

图左：铜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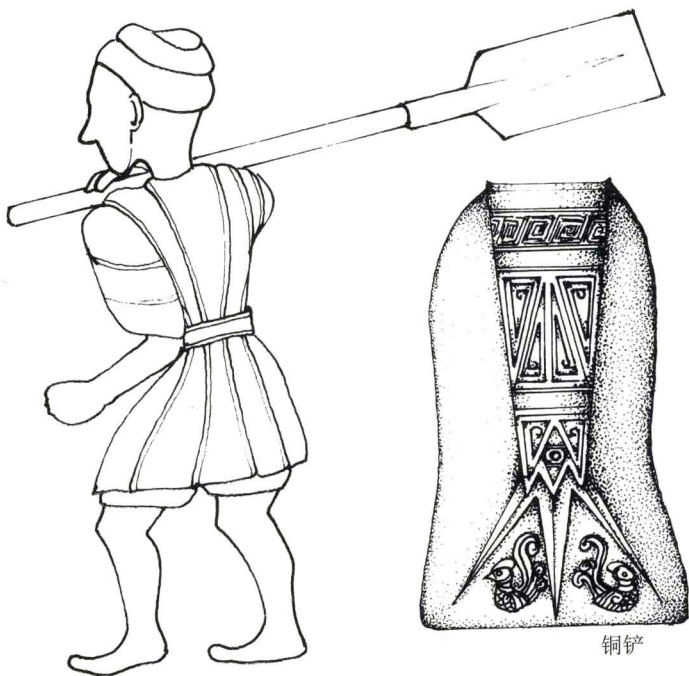
图右：青铜器上滇人负铜锄图



和铜铲的数量较多,也有少量铜镰、铜釜铁镰和铜爪镰。上述青铜农具绝大部分为实用器,也有部分器物上刻制孔雀及牛头等花纹,可能用于与农业有关的祭祀仪式,或者专为滇国上层人物随葬用的明器。

以上青铜农具中,铜斧的用途颇广,既可作为兵器,用于战争和狩猎,也可作为生产工具,用此砍伐森林、开辟耕地,以及加工竹木器。滇国铜斧多梯形,仅有少量为有肩斧或靴形斧。一般生产工具多无纹饰,兵器不仅有花纹,有的还有立体动物雕铸等。

铜锄是滇国居民常用的起土农具,器形与用途和中原地区的锄头相似,但釜部结构不同,全部为曲柄装置。此类青铜工具根据其器形变化,大致分为六种不同类型。最常见的一种为尖叶形,石寨山和李家山等滇文化墓地均有出土。整体似一片前尖后圆的树叶,釜部为三角形,突起于锄身正中。柄呈弯曲状,多用带叉丫的树枝略作加工而成。其余五种铜锄数量较少,有半圆形、梯形、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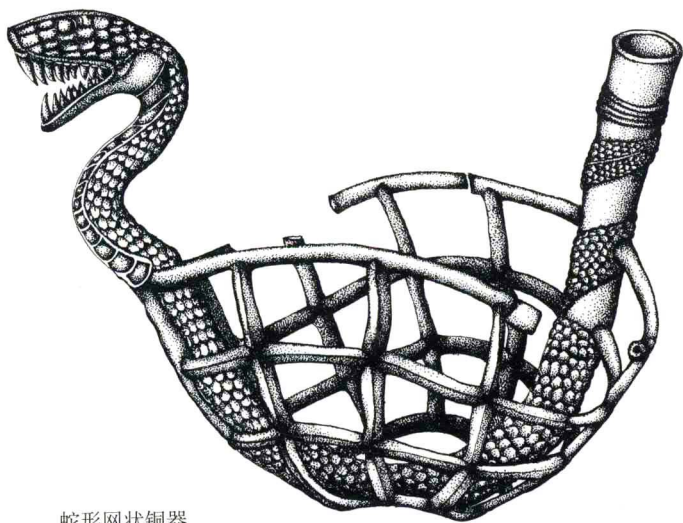


边形、曲刃形和荷叶形等,装柄方法及釜部结构与尖叶形铜锄相同。

铜铲是滇国青铜农具中数量较多的一种,整体作长方形,刃口齐平,直柄装置。主要用途是在田中铲草,有时也用于铲土,与近代的铁锹相似。

铜镰是收割带秆农作物的工具,整体作半月形,曲背、弧刃,右侧有圆形釜,直柄装置。收割时,左手握住农作物的秆茎,右手持铜镰之木柄,作钩刈状。因此镰在古代又有钩器之称。

铜爪镰也是收割农作物的工具,整体作半月状,弧



蛇形网状铜器

背、平刃,背上有单孔或双孔,与云南新石器时代常见的半月状石刀相似。使用时,用绳索或皮条穿入孔内,再系于使用者的右手中指,专门收割稻谷或其他农作物的禾穗。

滇国青铜农具中,还有一种器形十分奇特的蛇形网状铜器。整体作镂孔网箩状,一侧有圆形釜,另一侧为一蛇,昂首、露齿,蛇身下伸至网箩底部,尾绕其釜。此类青铜器仅见于江川李家山墓地,确切用途不明,似为水田中捞物之工具,姑列入青铜农具类。

多种迹象表明,滇国时期尚处于锄耕农业阶段,不仅未使用牛耕,也未见耒耜之类的耕作农具及其图像。尽管当时滇国青铜器上牛的形象很多,但都不用来耕田,有的作为“剽牛祭祀”的牺牲品,有的被宰杀食用,也有的作为商品或贡品,输入我国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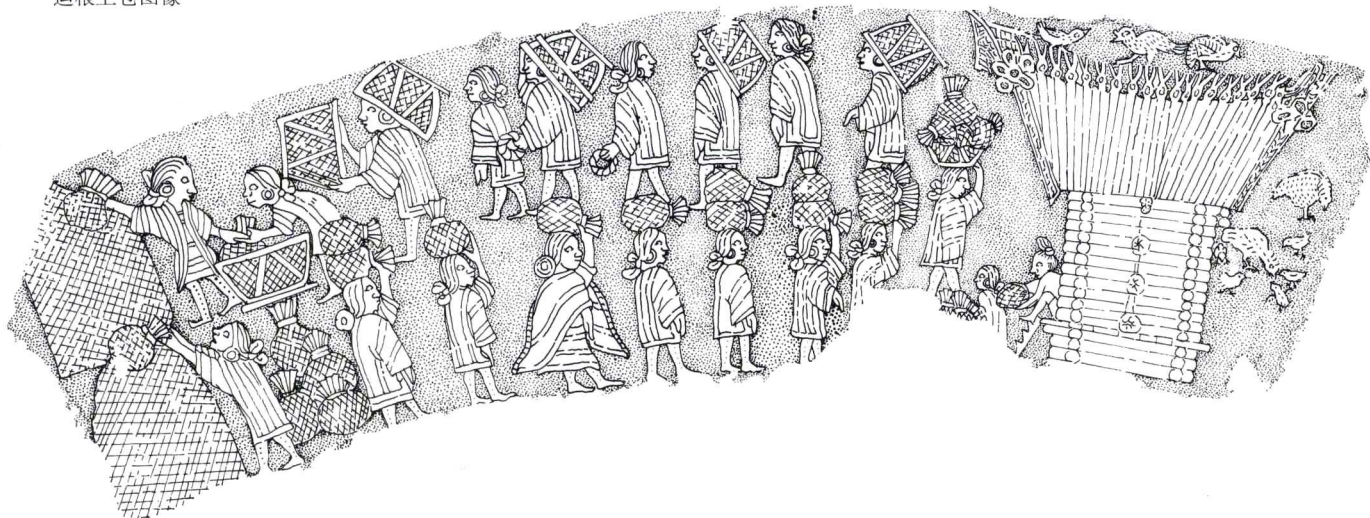
滇人的播种方式较粗放,有的用点种棒(一根削尖的木棒),有的直接用手撒种。如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出土的贮贝器上均有与农业有关的祭祀场面,其中有人肩扛铜锄或铜铲,有人手持点种棒,也有的人头顶籽种篮或身侧挎籽种袋,列队前往田野播种。

滇人用于旱地除草的工具主要为铜铲,一般水田除草不用工具,多用手拔或脚踩,云南人俗称“薅草”或“薅秧”。收割农作物用铜镰或铜爪镰,已如前述。滇国出土文物中未见专门的脱粒工具,近代云南少数民族多用摔掬方法使其脱粒,俗称“掬谷子”。也有的用脚搓或牛踩,想必滇国时期亦大致如此。

滇国时期农作物品种较多,除大量稻谷外,也有像中原地区一样的“五谷”。据《汉书·食货志》载,五谷包括麻、黍、稷、麦、豆五种。云南和我国内地不同,稻

谷一直是农作物的主要品种，麦豆麻次之，极少种黍稷，这大概和云南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有关。滇国农作物以稻谷为主，尽管我们现在发现的稻谷标本还不太多（因目前滇文化遗物多出自墓葬而非遗址）。官渡羊甫头113号墓腰坑中发现过大量稻谷及稻米标本，玉溪刺桐关滇

运粮上仓图像



文化遗址中亦有碳化稻谷出土。另外石寨山贮贝器上铸有运粮入仓图像，该图像之右侧有一井干式建筑的仓房，左侧有两个斜方格纹装饰的粮囤，表示为刚从田间收获的粮食；粮囤与粮仓之间有两列运粮入仓的妇女，囤前另有两妇女作搬粮状，仓侧有一男子接粮入仓；运粮者中有的头顶粮包，有的头顶竹箩，箩内再盛粮包；从仓房顶上有几只雀跃的小鸟和仓侧有一母鸡带领数只雏鸡啄食撒在地上的粮食余粒看，所运者也应该是稻谷或稻米。



牧牛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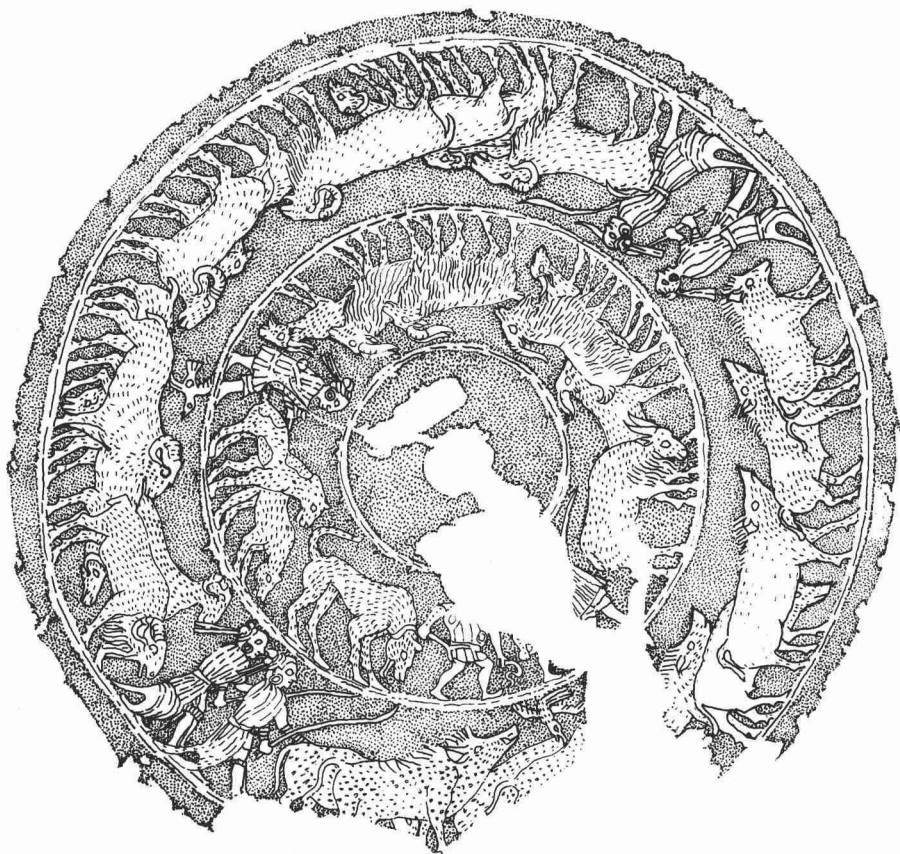
家畜饲养与驯服

滇国时期畜牧业也较发达，饲养着大批家畜和家禽。畜牧产品不仅是滇国居民的生活来源之一，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因此滇国对大牲畜的饲养、繁殖、医治及驯服均十分重视。

(1) 家畜品种。从滇国青铜器图像看，当地居民饲养的家畜主要有牛、马、羊（山羊与绵羊）、猪、狗等。上述家畜中牛的形象最多，以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为例，出土的青铜器上共有动物图像296个，其中牛图像为96个，约占总数的34%，石寨山墓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滇国居民饲养的牛全部为黄牛，至今我们还未发现过水牛形象。李家山墓地出土一件三骑士铜鼓，鼓面边缘雕铸三个骑士及一牛，此牛从体型和牛角上看，倒有点像水牛的样子，但颈下有垂肌（黄牛与水牛最明显的区别即颈下有无垂肌），又不像水牛的特征。尽管滇国时期饲养的牛都是黄牛，但从其体型上看，也并非一种品种。比如有的牛额头宽广，额前正中有明显的坑凹，牛角较长且粗壮有力，先从额脊两端平伸，然后再向上弯曲，脊上肉峰较高，大耳、长尾、颈下垂肌发达。有的动物学家认为，此类黄牛现仍残存于云南南部地区，很有可能与印度野牛有亲缘关系。另一种黄牛体型较小，额脊突起处略呈弧形，两角弯曲，先平伸后下垂，大耳、阔尾、脊上有高大的肉峰。此类黄牛数量较少，很可能原为我国西北地区及中亚一带的所谓“封牛”，后来随当地游牧民族南迁于云南，成为滇国居民的饲养对象。

滇国大牲畜中马的数量也多，而且有驰名全国的“滇池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滇池县，郡治，故滇国也……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为曰



牧羊放猪图像

滇池驹，日行五百里。”与神马交固不可信，但古代滇池产良马倒是事实。其马体小而雄骏，尤善山行，俗称巴滇马。东汉安帝时令益州郡设“万岁苑”，专养御马，其地在今滇池区域，所养之马或即所谓的“滇池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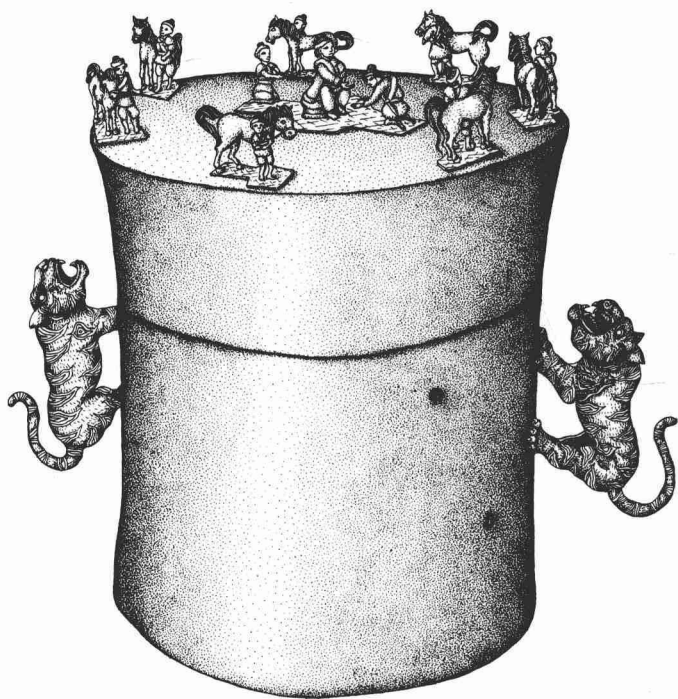
从滇国青铜器图像看，当地居民饲养的羊有山羊和绵羊两种。如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有牧羊图像，为四人三犬共牧羊17只，其中山羊6只，绵羊11只。李家山出土一件“三狼噬羊”铜扣饰，被噬者为一只体型较大，其角甚长，颌下有胡须的山羊。滇国青铜器上猪的图像较多，且有家猪和野猪之分。如石寨山贮贝器盖上牧猪图像中有二人牧猪9头；祭祀贮贝器上雕铸一妇女执盆喂猪等，很明显都是家猪。李家山出土“二人猎猪”及“二豹噬猪”等铜扣饰上的猪，一望而知就是野猪。

狗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出现较多，但品种似有不同。其中一种狗的体型很大，高与人肩齐平，尖耳竖立，尾上卷，显得十分健壮有力，如石寨山播种场面贮贝器上的两条狗；另一种体型矮小，尾长而四肢较短，给人以瘦劲、灵活的感觉，如李家山狩猎场面铜扣饰上的猎犬。前者多用于看守门户或作牧羊犬，后者则为猎犬，用于狩猎中追逐野兽。

(2) 大牲畜的繁殖、医治与驯服。牛马等大牲畜，

既是滇国的主要生活资料，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因此当地居民对其繁殖、医治及驯服均十分重视。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幼畜的出现与增加，乃公母畜的性交所致，而非感生所获，因此十分崇拜公畜的生殖器官，以及公母畜的交合形状。如石寨山和李家山出土青铜器上，凡为公牛的立体雕铸，工匠们都特意突出其生殖器官，显然是有其更深涵义的。又如李家山出土一件二牛交合铜扣饰，一公牛体型较大，两后腿蹬地，两前肢伏于母牛背上，头依母牛之腰部，尾夹于后股间，腹部前倾作交合状。这本来是一件供悬挂的装饰品，何以用二牛交合题材作图案，显然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具体表现。而生殖崇拜，又反映了滇国居民祈求畜群繁殖（亦即财富增加）的良好愿望。

滇国时期不仅重视大牲畜的繁殖，也关心其疾病的治疗。如李家山出土一件喂牛铜扣饰，一公牛伫立、双目呆滞、肌肉松弛、肋骨外现，很明显是一头病牛。牛旁立一人，头戴长沿帽，身穿紧袖



驯马场面贮贝器正视图

长衫，胸前挂一圆形圆底药罐，一手拉住牛角上的缰绳，一手持药喂牛，牛伸长舌尖作舔食状。此图像所表现的绝非一般的喂牛场面，所喂之物也不会是平常的饲料。

牛马等大牲畜，不经过精心驯服是不能役用的。如石寨山出土一件二人驯牛铜扣饰，一体肥肌壮的巨角牛，角上系有绳索，双目鼓圆，两耳伸直，鼻孔仰露作喘气状；牛前站立一人，用手按伏牛背，牛后又有一人，双手紧压牛胯作推挪状；此二人似在驯服此牛，牛角上套有缰绳，正说明它不是一般的放牧对象。又有李家山出土一件贮贝器盖上有驯马场面，正中一椎髻男子坐在鼓形座上，身后有人执伞，说明其为滇国上层人物无疑；此人前有一人作半跪状，腰佩剑，头微曲，双手前伸作申述状；中坐者怒目而视，一手上扬，一手前伸，用食指指向半跪者，显得十分激动；周沿有向同一方向走动的七个男子，服装同半跪者，其中二人佩剑，每人手中各牵一马旋转行走。此情节，很明显是一个驯马场面，中坐之人为监督驯马者，半跪者为具体负责驯马的头目，此人正向中坐者报告驯马情况，也许中坐之人并不满意，故怒目而视，手指小头目大声训斥。周沿七个牵马男子为具体负责驯马的士兵，所驯之马或作为战马，或用于狩猎。

狩猎活动及捕猎方式

狩猎业，是滇人仅次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要生活资料来源。尽管狩猎所获不如畜牧业那样相对稳定，但因古代滇池区域气候温暖，森林茂密，很适宜于各种野生动物的生长、栖息，因此要获得较多猎物，也并非十分困难。

(1) 捕猎方式。滇国时期常见的捕猎方式有集体围捕、陷阱套捕、骑马追逐和只身搏斗等四种。一般要捕获虎豹和野猪等凶猛动物，至少需要猎手二三人以上，而且需要有猎犬的密切配合。如石寨山出土八人二犬共猎一虎的铜扣饰，李家山出土七人二犬共猎一豹及二人二犬猎一野猪的铜扣饰，表现的都是滇国居民紧张而激烈的集体围捕图像。

陷阱套捕，也是滇国猎手们常用的捕猎方式。如李家山出土一件铜矛，在其銎部上段铸有栏槛及绳索等物，栏槛中立一虎，虎身被绳索所套，此虎已失去往日之凶相，站立槛内索然无力；虎侧立一人执剑欲刺，其下另有三人紧拉缚虎之绳。此图像很可能表现的是滇国猎人用我国古代所说的“阱获”或“网罟”之类套捕野兽的情景，所获动物大多都是活体。

一般善于奔跑的草食动物，如鹿、獐及麂子等，滇国猎手们捕获时往往采用骑马追逐的方法。即先纵马穷追不舍，一直将其追至精疲力竭时，然后在将及而未及的



狩猎图像

一瞬间，用长矛将猎物刺杀。

在滇人狩猎活动中，最为惊险、激烈的要数只身斗兽场面。如石寨山出土的一种青铜短剑上，在其刃部后段均刻有猎手只身斗兽图像；几个仅腰间系带的裸身猎手，手持短剑与虎豹作拼死搏斗，有的虎豹被猎手刺杀，也有的猎手被野兽咬死、咬伤。以上场面很有点像古罗马时期的“斗兽场”，在滇国则主要是为锻炼战士的勇敢作战精神及拼杀能力。

(2) 狩猎目的。由于滇国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不断发展壮大，狩猎活动在其经济领域中虽不占重要地位，但仍是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必要手段。除此之外，滇国时期的狩猎活动也有其军事和娱乐上的意义和目的。尤其滇王及其臣属驰骋猎场，那更是一种娱乐活动，正如中原地区皇帝及王公大臣的“春搜秋猕”一样，与正常的生产和军事训练毫不相干。至于那些骑马逐鹿的猎手们，从其华丽的服装和精美的装饰品看，显然不是一般的劳动者，他们参加狩猎活动，更主要的是为锻炼其骑术及马上拼杀能力，因为滇国时期十分重视骑兵，尤其是驰骋疆场的将军更受人们的尊敬。另外从滇国反映交易场所的青铜器上可以看出有买卖农牧产品及出售活体虎豹的图像，其中一虎被拴于柱上，其旁置一死犬，显然是担心出售前的虎豹掉了膘色，无非是想讨个好价钱。

纺织工具与纺织技术

滇国时期纺织工具及纺织技术均较落后，与当地新石器时代的纺织没有太大差别。陶纺轮和踞织机仍为当时的主要纺织工具，器形和结构上也无大的变化。

(1) 纺织工具。麻棉等纤维只有用纺轮加捻成线才能上机织布。据初步统计，滇文化墓葬共出土纺轮100余件，绝大部分为陶制品，另有铜纺轮8件，木纺轮2件和石纺轮1件。各种纺轮虽质地不同，但器形及结构基本一致，全部为实用器，个别铜纺轮上附有轮杆，杆上残留线痕。从石寨山、李家山及羊甫头等滇文化墓地出土的织机模型看，当时的织布工具仍停留在较原始的踞织机水平上。踞织机又称腰机，主要部件有经轴、分经棒、综杆、布轴、幅撑、打纬刀、投纬器及背带等。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踞织机部件多为青铜模型，仅李家山的经轴和布轴，其中段为木制，两端镶铜头。

(2) 纺织技术。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各出土一件雕铸有纺织场面的贮贝器，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滇国纺织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李家山的那件纺织贮贝器是1992年发现的，器身饰弦纹、圆圈纹、齿纹及云纹图案，器盖及腰部两侧各有一对虎形耳。盖上共雕铸10人，六人低头绕线，四人用踞织机织布，皆踞坐，发式各异。

石寨山出土的纺织贮贝器比李家山的更复杂，人物及陈设也多。此贮贝器盖上共雕铸18人，多为女性。其中一妇女通身鎏金，体型亦较其他人大，端坐在正中的方形坐垫上，身后有一男子执伞（伞盖已脱落），身前有捧盘者二人，站立者一人，盘内有肉食或果品之类；周围有捻线者、织布者、查看成品者及其他执事者多人，均为妇女，但发形、服饰各异；捻线者身侧挂一布袋，袋内装麻棉之类的纺织原料；织布者均踞坐，有的提综，有的引纬或打纬，全部低头专心织造，一片繁忙景象。

(3) 纺织品。滇国墓葬中出土的纺织品大多已破损，有的仅留残片，有的已成灰烬。青铜器上的人物图像虽有完整服装，有的甚至连花纹都看得非常清楚，但又不知其面料，这都为研究滇国纺织品及纺织技术带来许多不便。从滇文化墓葬出土纺织品遗迹及汉代有关云南纺织的文献记载看，当时的纺织原料主要有麻、棉、丝、毛等，其中麻是滇国最常见的纺织原料，有苧麻，亦有大麻。如李家山西汉中期墓出土一件铜柄铁剑，其柄部缠绕多层完整的麻布条，经云南轻工研究所鉴定为苧麻织品。昆明上马村和江川团山滇文化墓葬出土的兵器有的用麻绳捆扎，经鉴定用大麻中的苴麻制成。大麻与苧麻不同，雌雄异株，雄株曰枲，雌株称苴。麻为我国古代普通人的衣料，用枲麻织的布简称“布”，所以穿枲麻织品的人亦称“布衣”。苴麻一般不作衣料，或作麻绳，或专用丧服，因其纤维较粗，不易纺织。

木棉又称梧桐木，用木棉花絮织的布称“桐华布”，为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普通使用的衣服面料。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有梧桐木，其花柔如丝，人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同书又述：“云南郡……有上方夷、下方夷，亦出（桐）华布。”古代云南郡即今大理、祥云一带。丝绸为滇国大墓中常见的纺织品，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均发现过丝线和丝绸织残片，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鉴定为蚕丝。云南从东汉以来已有蚕桑及丝织品的记载。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有蚕桑、绵绢、采帛、文绣。”《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说：“永昌郡……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绢、帛等都是指丝织品而言。

汉代云南毛纺织业也较发达。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地区产“罽毼”；四川西南及滇北地区能作斑罽毼毡及旄毯之类的毛纺织品。其中斑罽、罽毼均属较细的毛织品，在汉代也算得上是一种高级衣料；毡毯很可能是不经纺织的毡类制品，可作御寒用的披毡。滇国青铜器人物图像中，亦多见此类服装的穿着者，有的毛织品服装上的花纹都非常清楚。